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13位ISBN编号：9787807207962

10位ISBN编号：7807207965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张朋园

页数：2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内容概要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叙述梁任公早期的思想及政治运动，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关心国事起，到三十九岁辛亥革命为止。

主文有七章：第一为任公的求变思想，第二为在国内时期的倡导民权及族类言论，第三为流亡日本后的排满论及建立民国的主张，第四为任公与孙中山的合离关系及其在庚子自立军之役中的奔走策划，第五为思想转趋温和的由来与主张立宪的影响，第六为与革命党的论战，第七为任公言论的总述，以统计数字看他的言论影响。

此外加上我自己的一点认识与感想，合计共得九章。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作者简介

张朋园，生于1926年。

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 - 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书籍目录

再版序 萧公权先生序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二、 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 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鼓吹革命——梁启超戊戌之前的激进言论与志气一、 明倡民权二、 隐言族类 第三章 新民、破坏、革命——梁启超流亡日本前期的革命言论一、 排满以兴民权二、 破坏以建民国 第四章 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一、 孙梁始合而终离二、 自筹革命起义 第五章 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的言行一、 言论转变的由来二、 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第六章 他山之石——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一、 论战述要二、 开明专制与约法训政三、 土地国有与国计民生 第七章 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影响一、 《中外公报》二、 《时务报》三、 《清议报》四、 《新民丛报》五、 《新小说》六、 《政论》七、 《国风报》 结论 梁启超大事年表（清季）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改革者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必须提出兴革的理想；革命者要改变旧有的政治，必须倡导革命的主义。

兼具改革与革命企旨的梁任公，有其理想及主义。

最早他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便倾心于固有的“大同之义”，及至他在自修中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言论，又将中西思想的相同处融会贯通，欲进中国于“民权政治”。

这大致是任公的理想与主义。

梁任公思想上的衍化，有其一定的进程。

在他的幼年时代，虽然常受到父亲的呵斥，不得自视如常儿，实际上任公并无异人之处，仅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孩子而已。

他自述： 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蒙蒙然不知天下事。

他的思想上的衍化，随着他所受的教育而改变。

早年，任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学习的是帖括训诂词章，他的老师是他的父亲和祖父： 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

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

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

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太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十五岁始正式进入广州府的学海堂，除训诂词章外，少涉其他，于他的思想并无启示： 十五岁… …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

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己丑，年十七，举于乡。

不过，任公对于固有典籍作深入的阅读，亦在其十四五岁这一段时间里。

《轡轩语书目答问》对他颇有影响： 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轡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以后他见着康南海能有所应对，大多得力于此一时期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其思想上能受到启发，亦得力于这时建立起来的根基。

到了十八岁，得闻康南海名动公卿的清誉，因陈千秋之介而拜于康氏门下。

以举人反拜秀才为师，通古所无。

而任公思想从此大为开启，是他早年最大的转变： 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

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弃旧学。

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南海以大海之潮音，作狮子吼，使任公自兹始知天地间别有学问。

影响他最深的，第一是康氏的那部《长兴学记》。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任公曾一再提到： 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

……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

……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那稿本不过两三人曾经见过。

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宝藏篋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细读，读了已不知几十遍，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后来毅伯先生常对人说道，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

…… 《长兴学记》是一篇治学修养论。

同时又发挥平等之义： 夫性者，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故孔子曰性相近也。

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时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

主张与民同患难： 易曰：吉凶与民同患。

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

……故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虽舜禹复生，无以易此。

此两者对于任公都有极深刻的启发。

第二是任公三十岁以前所爱谈的“三世之义”，他的求变思想的基础即在其中。

康南海记其讲授三世之义说： 光绪十六年……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

八月梁启超来学。

……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义。

……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

……又告以天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

……任公本人亦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其弟子得读〔大同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

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一部分。

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这是今文学家一派自中国典籍中发掘出来的救时主张，康南海据为政治运动的理论。

康南海以为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有一定的程序。

他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尧舜之治。

他说尧舜之治，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假设；孔子是个政治改革家，也是社会改造家，设尧舜之治为理想的社会——太平盛世——而已。

既然如此，他认为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据乱之史。

自许有改进世运责任的康南海，不容中国长此永为据乱，他要将中国变为升平之世。

康南海对于升平之世有其解释，他以为升平就是小康之治，正如《礼记》中所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他对于太平之世也有解释，那就是《礼运》中的《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予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虽然南海已幻想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却只主张言小康，不能言大同。

他并没有说明不言大同之理，只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可是这大同之义，有点石成金之效，今为任公得闻，窍门为开，思想为之大变，救中国的沉痾痼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疾，非此良药莫属。

欣喜欲狂，锐意欲将之宣传。

三世之义的太平之治，隐涵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味，任公比他的老师的思想更为迈进一步，认为与其进小康，不如进大同。

此后，他将三世之义，一一推移衍说，施之于政治，主张民主：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

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酋长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

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日君民共主之世。

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日有总统之世，二日无总统之世。

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

施之于教育，主张开民智：吾闻之，春秋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施之于法律，主张变法以因时制宜：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

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之律法，有治太平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

施之于经济，主张平货齐物之道：观时变者，商之事也……据乱以至升平之事也，若太平世必无是。

……太平之世，自有平货齐物之道。

不仅如此，任公在他的若干言论中，都曾引申三世之义。

如论“群”与“独”：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

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论“陵人”与“公理”：吾闻之，春秋之义，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

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恶风渐消，而天然之公理渐出。

论“强权之道”：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

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

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极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

论“中外一体”：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张三世之义。

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

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

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

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亲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

今论者持升平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让诸夏也。

论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科举敝政乎？

科举法之最善者也。

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乃至西方的文明进步：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日蛮野之人，二日半开之人，三日文明之人。

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进化之公理。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总之，三世之义，无处不在，无处不可运用。

三世之义是任公求变的基础理论，是一切论辩的原理根据，甚至变成了公式。

任公既得三世之义，即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进小康于大同。

既欲进小康而大同，则又必须实现孔子的思想。

他认为孔子是进化主义者，绝不保守，据此以要求进步；说孔子是平等主义者，绝不专制，据此以要求人人平等；孔子是兼善主义者，绝不独善其身，据此以要求开启民智；孔子是强立主义者，绝不文弱，据此以要求国人自强；孔子是博包主义者，绝不卑狭，据此以要求接受外来的文化；孔子是重魂主义者，绝不爱己一身，据此以要求自我牺牲。

归纳他所发明的孔子思想，可以看出任公求变的思想更为条理化，他一面倡言三世之义，一面引证孔子的言行以为辅佐。

他在《读春秋界说》中有：春秋之各例，犹天元一也。

命天元一，所以待加减；设各例，所以待变例者，无不变者也。

使其不变，则无所用其例矣。

（界说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义，义既明则例不必泥）这是孔子求变的例证，也是任公求变的例证。

孔子既然待变，则一切无不变之理。

然则何以中国二千余年竟停滞于小康的局面，而不能进于大同？

任公亦有其个人的解释。

他说孔子的微言之所以不传，与孔子的施教有关。

孔子教人，有普通与特别之不同。

“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是因材施教。

某些人只可以教予《论语》，某些人则可以教予《易》及《春秋》。

《论语》、《易》、《春秋》这三部书，深浅不同。

《论语》是雅言，言小康，属于普通的学问；《易》与《春秋》，涵义深奥，言大同，属于高深的学问。

才高者，可得《易》及《春秋》，才中下者，只能得《论语》而已。

接受孔学的真传者，是孟子、庄子、荀子三人。

此三人中，庄子和孟子属于高才，庄子得了《易》，孟子得了《春秋》；荀子才下，得了《论语》。

中国二千年停滞不前，任公认为责任应由荀子一人负起。

因为他传小康之治，汉兴以来，他的弟子控制了中国全局，主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义，重考据，这是中国不进步的症结。

任公认为今天的世运已经到了大同之治的阶段，荀子一派误我中华二千余年，今日宜亟起求变，弃荀学而倡孟学。

他认为“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孔子……立大同之义，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孟子所述皆此类也。

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行者，可决他日之必行者。

而且孟子的经世宗旨在保民：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

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

“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

”此义本于春秋，为孔子特立大义，后之儒家，惟孟子能发明之。

……泰西诸国，惟美洲庶近之。

“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

”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深知其意，可语于道。

“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效”：孔子之言性也，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
荀子传其据乱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传其升平世之言，孟子传其太平世之言。
各尊所闻，因而相争，苟通于三世之义，可以了无窒阂矣。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编辑推荐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

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萧公权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

著者在当时（写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

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

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

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

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作者张朋园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